

超能主动性与高科技捐赠者： 关于当今新慈善家群体的全新理论

保罗·G·谢维什*

社会学名誉教授兼创始主任（已退休）2023年2月——基于一篇同名工作论文

当今财富与能动性的课题

“社会行动……可能针对他人的过去、现在或预期的
未来行为。”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2页）

各个时代财富持有者的显著特征在于，他们享有最大的选择范围——或称“超自主性”——至少在物质领域是如此。这包括确定并实现他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为自己、家人和周围世界做些什么。

如今，越来越多的个人正在接近、实现甚至超越其满足物质需求的财务目标，而且实现这一目标的年龄越来越小。一种此前仅属于零星统治者、将领、商人、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富裕程度，如今已成为广大群体乃至整个文化的特征。历史上首次，如何将广泛物质层面的选择能力与精神层面的品格能力相协调这一问题，摆在了一个国家如此众多民众面前。

我们将这些及其他趋势视为“慈善新物理学”的一部分（Schervish 和 Havens，2001、2002）。

对于我国乃至全世界日益增长的人群而言，二十一世纪亟待解答的引人深思的新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 在富裕时代，个人将如何塑造自身、家庭及社会的自愿财务道德？
- 选择数量的激增将如何转化为选择质量的更深层次发展？
- 当获取更多财富已不再是首要追求时，财富如何才能成为实现人生更深层目标的工具？

更直接、更深入地参与慈善事业，只是财富持有者满足其辨识并践行我所称的“道德传记”的一种方式

波士顿学院 财富与慈善研究中心 与慈善

关于本中心

财富与慈善中心（CWP）于2015年保罗·谢维什退休后关闭。该中心始建于1972年，最初名为社会福利研究所，是一个跨学科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富裕时代的精神生活、财富、慈善以及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财富与慈善研究中心在经济实力与慈善之间的关系、参与慈善活动的动机，以及关怀行为的深层含义与实践方面，被公认为权威机构。该中心以其社会学、哲学、神学和统计学研究而闻名，其中包括关于财富转移和慈善黄金时代的开创性研究。

联系方式 保罗·G·谢维什

手机：(617) 270-7674

电子邮件：paul.schervish@bc.edu

如需阅读报告、工作论文及已发表文章，请访问：

 保罗·G·谢维什——简历，
按年份分类的报告与文章

:

财富（Schervish 2006）或财富持有者如何将其雄厚的财务能力与相应的道德准则相结合。经营或创办企业、进行投资以及照顾家人和朋友，只要选择得当，都是道德传记中同样崇高的道路。这一切不仅构成了财富的道德传记，事实证明，它同时也体现了“超能动性”。

关于能动性与超能动性的背景

本文旨在构建“超能动性”这一理论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解读高科技领域捐赠者——特别是富裕捐赠者——的慈善行为。

过去三十年来，人们对“能动性”这一概念的兴趣显著重燃，将其作为理解个体实践的概念工具——个体既受制于环境，又能改变环境（Giddens 1984；Sewell 1992；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这种对个体实践的强调，部分源于研究者为了反驳结构主义分析所做的努力——后者侧重于描绘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由这些位置决定的关系模式（例如，Wright 1997；Wood 1995）。与地位分析相对的是，这种研究侧重于能动性，以及行为主体在既定条件下所作出的相对自由的选择及其实际实践。这种方法与个人慈善理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后者强调个人对其所处世界的自愿性及潜在的变革性影响。

我们过去四十年来关于财富与慈善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涉及

确定一种独特品质，该品质区分了财富持有者在商业、政治领域，以及生活方式和慈善领域中所获得的赋权（Schervish 等 1994；Schervish 1997）。我们的研究发现，至少在物质领域，财富持有者的阶级特征是“超能动性”。

“超能动性”是一系列使个体能够相对单枪匹马地创造其所期望的世俗结果，以及创造其自身与人行使能动性的条件的倾向与能力。如果说能动性是在社会既定的规则和资源范围内做出选择的能力，那么超能动性就是成为这些规则和资源的创造者或生产者的能力。如果说“行动者”是在有限的可能性范围内为自己寻找最理想或最合适位置的人，那么“超行动者”则是为自己及他人开辟这些可能性的创造者。那些需要借助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运动才能实现的目标，超行动者几乎可以单枪匹马地达成。

得益于安德鲁·赫尔曼（Andrew Herman）——他是在一次深夜电话交谈中首创了这一术语——我们在关于财富与慈善的研究伊始便发展并运用了“超能动性”这一概念（Schervish and Herman, 1988）。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尚未阐明该概念与能动性理论文献之间的联系，尽管我已将其作为核心解释性概念，用于对高科技财富持有者的捐赠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并由此延伸至当今其他新兴慈善家群体。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借鉴社会学文献，梳理了能动性理论中那些有助于阐明“超能动性”一般内涵的方面（Emirbayer 和 Mische，1998；Alexander，1992；Archer 1982；Coleman 1990；Turner 1994）。在第二部分，我详细阐述了

“超能动性”这一具有特定倾向和能力的独特能动性类型的含义。在第三部分，我将“超能动性”作为主要解释性概念，用于分析高科技捐赠者在商业和慈善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与实践。结论部分指出了“超能动性”对理解高科技领域以及当今其他新型慈善家的启示。

1. 关于能动性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仅回顾能动性文献中的部分主要研究方向，以便进而综合阐述笔者关于能动性及超能动性的积极理论。

在超越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性二元对立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例如布迪厄（1984）的贡献，尤其是吉登斯（1979、1984）在其“结构二元性”概念中的阐释，以及苏厄尔（1992）和埃米尔拜尔与米舍（1998）对吉登斯理论的全面重构。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社会结构仅具有“虚拟”的存在，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时刻，由具备较高程度反思性自我意识的个体能动者所体现。因此，社会结构并非一种建筑或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一个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不断展开的能动过程——即结构化过程。与此同时，若没有现存的规则（塞维尔称之为“代码”）和资源，能动性便无法发生。这些规则和资源既赋能又约束个体和集体的能动性。对吉登斯而言，结构具有双重性，因为它同时兼顾了稳定与创新。结构化理论阐释了人类能动性在与模式化制度存在相关联时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变革潜力。因此，对吉登斯而言，能动性是个体行为者在已知与未知的条件背景下进行的有目的实践，并由此产生预期与非预期的后果。

能动性是个人

，通过这种实践，他们行使权力或能力以实现变革性再生产。换言之，能动性是个人在既定结构条件下开始、并最终导致结构结果发生变革性再生产的实践。吉登斯坚持“变革性再生产”这一概念，旨在表明能动行为不可能简单地再现过去，因为每一项行动在时间、空间和环境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与此同时，没有任何能动行为能够完全具有变革性，因为任何变化都与其在时空中的起源有着有机联系。

对理解能动性而言，埃米尔拜尔和米舍（1998）的贡献同样重要。他们提出了一个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为焦点的能动性“和弦三元组”——这与吉登斯提出的“结构条件、能动性、变革性结果”三元组颇为相似。埃米尔拜耶和米舍将能动性定义为“行为者对不同结构环境——即行动的时间-关系语境——所进行的、在时间维度上构建的参与；这种参与通过习惯、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相互作用，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历史情境所提出的问题时，既再现又转变了这些结构”（作者强调）（第970页）。

和弦三元组的第一方面是迭代或循环要素，它涉及行动者如何与过去建立联系：“它指的是行动者有选择地重新激活过去的思维和行动模式，这些模式通常被纳入实践活动中，从而为社会宇宙赋予稳定性和秩序，并有助于在时间长河中维持身份认同、互动关系和制度”（作者强调）（第971页）。第二个方面面向未来。这是投射性要素，类似于吉登斯（Giddens）关于面向创造未来事物的战略性行为的概念：“投射性涵盖了行动者对未来可能行动轨迹的想象性构想

，在此过程中，既有的思维和行动结构可能会根据行为者对未来的希望、恐惧和渴望而得到创造性的重构’（第971页）。能动性的第三个核心方面与当下相关。这是实践性评价要素，决定着如何连接过去与未来：“行为者针对当下不断演变的局势中出现的需求、困境和模糊性，在多种可能的行动轨迹中作出实践性与规范性判断的能力”（作者强调）（第971页）。

我同意埃米尔拜尔和米舍的观点，即在这三个要素中，最被忽视的是投射性要素。吉登斯及其他学者往往更倾向于探讨那些制约能动性的社会结构方面，尽管他们在理论中并未将该方面置于优先地位。他们强调，既定情境如何作为一套约束与赋能机制，既限制又增强了行动者的意志性能动性。能动性的变革性或塑造性方面在该理论中并非缺失，但这些方面并未像先于能动性并对其产生制约的结构规则与资源那样受到强调。

吉登斯、埃米尔拜耶尔和米舍的研究，充实了我对能动性的理解——即行为者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实践来弥合过去与未来之间差距的过程。

对我而言，将慈善视为能动性这一更广泛的综合理解的出发点，在于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1999）中对选择与美德关系的广泛讨论。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生的目标是幸福，并暗示幸福是通过弥合“当下所在”与“理想之境”之间的差距而实现的。这种差距正是通过做出选择来弥合的。在规范意义上的最佳状态下，这些选择都浸透着一种实践智慧（*phronesis*）。因此，能动性是一套实践，它既落实了行为者面临的可行选择，又构成了一种从

生成（*genesis*）到完满（*telesis*），从历史到理想。亚里士多德强调，明智的选择既需要自愿行动的自由，也需要智慧这一美德。没有自由便无美德；没有美德便无真正的自由。没有能力便不可能做出选择，正如没有美德便不可能正确引导能力一样。

因此，做出明智的选择就是道德能动性的实践，即能力与品格（或道德指南针）的结合。请注意，在此我并未对构成智慧或明智选择的具体内容作出任何界定。

实践智慧被理解为一种敏锐或有良知的规范性取向，它驱动着行动者。这类似于埃米尔·涂尔干所说的“道德导向行为”——他与社会学萌芽时期的其他人将这一概念溯源于拉丁语“*mores*”，意指那些为行动提供框架与追求的习俗、传统或充满价值的规范性潮流。

因此，在我的理论框架中，能动性是指在社会与个人条件背景下，为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实施的实践性-评价性选择。由此可见，能动性围绕着起源、目的以及连接二者的选择而展开。这正是埃米尔拜尔和米舍所称的惯例、目的和判断（第963页）。就过去而言，能动性植根于由规范性和存在性思维、情感及行动框架所构成的条件之中，同时也由人力和物质资源构成（吉登斯，1984；苏厄尔，1992）。进而，能动性旨在实现个体的规范性与乌托邦性框架；并致力于创造人类与物质资源的新分配或新秩序。能动性是人类基于选择的因果实践领域，它依托于能力与道德基础的生成性或起始条件（个人与社会层面），以产生能力与道德追求的终向性结果（个人与社会层面）。

2. 超能动性

我此前已指出，关于能动性的研究大多围绕过去而非未来的问题展开。埃米尔拜尔和米舍指出，未来是社会行为者“构建不断变化的图景的领域”，这些图景涉及他们认为自己将去往何处、希望去往何处，以及如何从当前所在之处抵达那里”（第984页）。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一些当代理论家倾向于否认财富持有者及其他看似具备能力的行为者能够不受约束地构建新的社会秩序。例如，阿伯克龙比、希尔和特纳在其著作《主导意识形态论》（1980）和《资本主义的主权个体》（1986）中主张，即便是天赋异禀的个体也无法决定历史的进程。

用埃米尔拜耶和米舍的术语来说，阿伯克龙比、希尔和特纳会认为：尽管个人可能会就其所处位置及期望去向发表任何内部或外部言论，但经济组织的约束——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决定性地限制了替代性未来的创造。他们特别指出，一方面是“有效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实际运作及其内部经济主体的特征，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同样，他们在第二本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日益官僚化的性质与个人主义及个人效能的意识形态话语相矛盾。赋权的自主个体根本无法通过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来体现其意志。他们得出结论：尽管主权个人主义的愿景主导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都不存在这种个人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的构建和治理中，不可能存在纯粹或完全决定性的“超能动性”。

我认同这一关于社会基本运作机制的控制分析。不过，我认为财富持有者是主权个体，能够将其抱负和期望转化为实际实践和组织形式——无论是在其影响力的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事实上，正如吉登斯（1984）所坚持的，所有个体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条件下，都有能力通过能动性来塑造结果——尤其是在融入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时。

总而言之，我承认并非所有个体在社会或文化塑造方面的能动性都相同。“超级行动者”并非神明，而是半神。而我们这些“普通”个体也并非没有能动性（尽管受到限制）。事实上，今天我们目睹了人们重新强调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如何展现韧性，以及如何认识、行使并拓展他们的能动性。尽管如此，很明显，即便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中能动性得到了扩展，也无法与那些天赋异禀的“超能行动者”投射其意志的能力相提并论。简而言之，即便是“超能行动者”也受到制约。

尽管如此，那些具备强大物质和心理能力的人，不仅能够为自己，也能为他人塑造不同的未来。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点是，并非所有“超能行动者”都是财富持有者（例如，正如桑顿·怀尔德在《我们的城镇》中所提醒我们的，“某些圣人和诗人”）。尽管如此，所有财富持有者至少在物质层面上都具备这种能力。财富持有者独具物质资源和认知倾向，这使他们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体，都能塑造自己期望实现的结果。财富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赋权能力。虽然所有个体都行使能动性，但超能动性的独特阶级特征在于：能够建立而非仅仅接受其所生活的社会矩阵。富人

在时空之中构建了一个世俗的领地，同时也构建了一个个性的内在领域。因此，“超能能动性”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更是一种独特的道德身份。

对吉登斯而言，能动性是参与结构化过程：能动者置身于结构性条件之中，并通过能动性对这些条件进行再生产性转变。在我看来，与吉登斯所说的能动者相比，超能动者对构成结构性条件的框架和资源，以及对构成社会结果的框架和资源，拥有质上更强的掌控力。这并非意味着超能动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彻底改变周围的整个世界。但他们在商业、金融、家庭、消费、政治和慈善等日常实践中，能够且确实在自然而然地运作着结构化的变革机制。

超能能动性的要素——能力领域与道德指南针

在《财富福音》（Schervish、Coutsoukis 和 Lewis，1994）一书中，我描述了构成“超能主体”在行使生产性能动性时所依托的资源的三大相互关联的能力要素。它们分别是

- (1) 心理赋权——怀有远大期望的倾向、这些期望的正当性，以及实现它们的信心；
- (2) 空间赋权——建立抵御侵扰的防护壁垒，并将个人影响力在地理上延伸至自身直接存在范围之外的能力；以及
- (3) 时间赋权——重塑过去、塑造现在并联结未来的能力。

显然，这种能力并不能保证超能代理人会做出明智的生产性决策，并创造出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成果。然而，它确实能保证此类个体拥有广阔的选择视野，其选择能够塑造自身目标，而这些目标将促进或阻碍他人的目的性终点。

除了运用上述资源外，生产性能动性还调动规范性和存在性框架来指导资源的使用。在《财富福音》（1994）一书中，我还描述了规范取向中三个相互关联的规范取向方面，这些方面共同作用以规范超代理人的生产性赋权：

- (1) 日常践行被视为美德或品格力量的行为，这些行为指导超主体如何应对生活赋予他们的机遇与障碍；
- (2) 个人在经历从一种社会地位和个人身份向另一种转变的形成性人生历程过渡时，所必须经受的道德品格的特殊考验；以及
- (3) 将人生中的大小事件转化为生命、死亡与重生的救赎过程，以此寻求治愈、学习、宽恕与合一的内在驱动力。

日常美德的践行、过渡期中尽责的承诺以及对蜕变的追求，这些道德取向的方面——当与心理、空间和时间层面的赋权相结合时——构成了能动性的意义与实践的**总体框架**。而当这些方面以制度性塑造的方式得以践行时，即以一种富有成效而非仅仅参与性的方式，它们便构成了超能动性的意义与实践。

超能动性 with 高科技捐赠者

现在，我将探讨超能动性所蕴含的内在物质与倾向性能力，因为它支撑着高科技捐赠者的特质与实践。他们在商业往来中孕育出这种超能动性，并将其转化为慈善实践。

在阐述和论证超能动性的运作机制时，我借鉴了《**2001年高科技捐赠者研究**》的调查结果，该研究于2001年1月至3月期间开展（Schervish、O’Herlihy和Havens，2001）。该研究受专业筹款人协会（前身为全国筹款高管协会）委托开展，由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R.B. Pamplin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罗伯特·B·潘普林博士发起并资助。研究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高科技领域财富持有者在商业中积累财富的方式与其将财富分配给慈善事业的方式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第二，厘清围绕高科技财富与慈善事业的个人、商业及慈善相关议题的范围。第三，阐明研究结果对理解和改善高科技捐赠者慈善活动发展轨迹的启示。

第四个问题是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深化我们对慈善事业整体上新兴问题及前景的理解。

当与感恩、认同和联结的动态相结合时，“世界构建”并不会止步于他们的家门或企业大门。它延伸至他们所参与的各个领域，包括（对于那些选择参与的人而言）政治、社区、宗教和慈善事业。就个性而言，富人并不比其他更自私短视，也不比其他更具社会责任感。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人们心中都怀揣着远大期望与宏伟抱负。财富持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更名正言顺地对实现这些期望和抱负抱有信心，因为他们有能力直接促成自身愿望的实现。一位退休的惠普高管（所有身份信息均已更改）表达了心理赋权所赋予的那种积极进取、勇于作为的心态：

我认为，对于投身初创企业的年轻高科技创业者来说，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能在一个小而灵活、反应敏捷的环境中工作——那里可以像特种部队一样说：“嘿，咱们去干点什么吧”，然后亲眼见证事情的完成，因为这正是他们过往的职业经历。……所以这些人的职业经历是这样的：召集二十到四十人，看到某个需要完成的产品，就立刻着手开发。两年后，产品就上架了。

你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也是他们带入慈善事业的心态。

高科技领域的捐赠者虽是慈善事业中的“超级推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构思或实现重大的创新举措。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往往会更多地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更积极地参与将其付诸实践。某互联网通信公司的退休联合创始人表示：“我现在深信，只要你真正花时间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你的愿景和目标就能实现。我坚信将它们写下来，它们往往会变成现实，因为你会开始采取行动去实现它们。”

“超级行动者”在慈善事业中展现出创业精神的两大核心特征。首先，他们能识别出创新理念：他们能洞察那些需求超过供给的产出领域。

其次，企业家通过直接掌控生产，积极影响其投资的回报率。高科技捐赠者的独特群体特征在于，他们不仅能支持，更能亲手促成特定的慈善项目。慈善领域的“超能代理”将资金用于塑造重大成果。正如我所言，在行使这一能力时，高科技捐赠者是慈善事业的“生产者”而非“支持者”，是“发起人”而非单纯的“捐助者”。发掘那些需求巨大但资源匮乏、被忽视的社会领域，正是我们采访的许多受访者明确提出的策略。这种通过自身努力识别并实现愿景的态度，几乎在所有高科技捐赠者身上都有体现。

一位来自西海岸的前惠普高管谈到，挽救一项已告流产的环保倡议是多么“鼓舞人心”。“所有曾为此付出努力的人都感到非常沮丧，”他在谈及那个曾试图收购部分林地的组织时说道。但凭借着巨大期望带来的心理动力，以及创建一个时空领地的物质条件，这位“超能代理人”不仅制定了计划

，并具备了非“超级行动者”难以置信的执行能力。“那我们为什么不试着私下筹集这笔资金呢？”他对他们说；“他们回答：‘听着，此前从未有人为私人土地的保护项目筹集过1300万美元，而我们只用了大约三个月就做到了。’”对他而言，实现可能之事本身就是一种回报：“看到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能保护如此广阔的区域、保护猓獭种群等等，这让我感到非常有力、充满动力；这确实令人深受鼓舞。”

此外，这位慈善转型专家将自己的筹款成功归功于自身的高效执行力，以及能够网罗同样具备这种能力的“超级执行者”。他说，他本人以及所有为筹集这1300万美元而招募的人，“都来自一个真正赋予人力量的行业——在那里，你可以决定去做某件事，两年后就会出现某种产品，被全世界每一家公司所使用..[这些]人多少都相信‘哦，我只要走出去做点什么，最终这基本上就会变成某种产品’。他们并不觉得改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思维也延伸到了慈善领域。“所以当你去找这些人，对他们说：‘请捐款给我们，一两年后，你将与其他一百人一起，亲手帮助保护了这25,000英亩土地和猓獭种群，你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本质上你将创造出一种‘产品’”，他们立刻就明白了。他们对此毫无迟疑——他们说：‘太棒了，我就这么做。’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常提到“捐赠者”和“大额捐赠者”。而将慈善事业的支持者与“生产者”区分开来，则是一种更具功能性的区分。每一项慈善事业都在寻求资源，以产生成果来回应社会需求和利益。大多数个人对

捐款呼吁的反应，与消费者对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反应如出一辙。他们只是庞大参与者群体中的一员。单凭个人，既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让企业专门为他们开发产品；也没有足够的捐赠能力单枪匹马地创建或重新定位他们所捐助的慈善机构。

只有当普通捐赠者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协同行动时，才能塑造慈善机构的命运或使命。由于决定一项事业存续与方向的，是众多个人的累积支持，而非任何特定个人的支持，因此资源有限的个人至多只能被视为联合生产者或辅助生产者。

当高科技捐赠者捐赠数额足够大，以至于能够实际塑造慈善机构或非营利组织的议程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可被称为直接生产者或设计者。当然，这种直接生产具有双面性，因此，辨别在何种条件下慈善领域的“超能代理”会产生关怀而非控制，这一点始终至关重要——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一点。

慈善领域中直接生产的极端案例，是个人创立全新的慈善组织或项目。我们听到了若干案例，讲述高科技捐赠者如何已经或计划创建私人基金会或运作型基金会。一位受访者已着手提高教师薪资，通过为某所学校提供资金来实现这一目标，希望这种积极影响能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周边学校也采取类似措施。另一位受访者解释说，他未来五年的梦想是设立一个基金会，为他家乡市中心地区的教师涨薪提供资金——他曾在那个更有利的时代于该地就读。还有一位高科技领域的捐赠者以非正式的方式实现了慈善目标：他通过经济上的“资助”来支持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侄女。还有一位则向自己和妻子的

兄弟姐妹提供足够丰厚的捐赠，使他们获得一定的经济保障，从而能够根据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而非对收入的需求，自由地做出人生选择。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无论远在异乡还是近在咫尺，“带来改变”的可能性与实践，正是支撑高科技慈善家决心与主导力的根基。这种超能动性渗透于高科技捐赠者的所有慈善事业之中，但尤其体现在我们所称的“介入式慈善”的三种形式中。

“介入式慈善”的多种形式

严格来说，“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这一术语催生了与其相似的“风险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它指的是投资者或多或少积极地投入资金和专业知识，有时甚至直接参与，以推动由他人发起的创业活动。但在慈善领域，这一术语需要被划分为三种可辨识的、多维度的做法。我们发现，通常被归入风险慈善范畴的许多内容，更准确地说是“管理型慈善”或“创业型慈善”。

管理型慈善是指在不提供资金的情况下，通过贡献组织管理专长来提升慈善组织的效能。一个典型例子是受访者，她的财富主要投资于一家硅谷互联网初创企业。她向母校斯坦福大学捐赠了少量资金，但贡献了大量管理专长，以协助筹款并开发更有效的筹款方法。一位前软件企业家对这种管理策略作了更详尽的阐述：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在于管理方面。我懂得管理人，了解人的工作方式，不会试图将所有人一概而论，而是理解每个人的差异。纯粹的企业家通常都是很糟糕的管理者，因为他们希望一切在五秒内完成，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在三十秒内搞定。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聪明——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们那样看待问题？于是他们只想直接踩下油门，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我虽然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但我知道还有刹车，也知道何时该使用它。

创业型慈善是指财富持有者同时投入人力资本和资金，以创立新的慈善机构或在现有慈善机构内设立新部门。例如，奥斯汀有一位高科技企业家，他将大部分慈善资金和时间用于监督自己创办的慈善初创企业，该机构致力于消除城市青少年面临的数字鸿沟。一位自称社会企业家的人在创办自己的慈善机构时，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例子：

在我看来，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是那种看到某种不存在的事物时会问“为什么它不能存在”的人，而不是那种看到某种事物时就断言“那不可能发生”的人。在我看来，企业家是愿意从无到有创造事物的人，是愿意亲力亲为、不畏脏活累活，推动并引发变革，创造新理念、新机构或新组织，并从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努力中获得回报的人。社会回报或许可以用社区资本、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来衡量。它恰好不是以金融资本来衡量的，但其背后的创业本能和驱动力依然如一，只不过聚焦于社会领域罢了。

风险慈善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式，即第三种介入方式。它将管理建议和资金注入慈善事业，但不会像企业家那样介入日常事务的直接管理——这正是企业家的标志性特征。在此，我以一位波士顿软件企业家为例：他不仅创立了自己的家族基金会，还通过提供资金和专业技能，协助他人确立目标、制定计划并就如何有效利用资金提供建议，从而帮助慈善机构起步。一位退休后创立家族基金会的软件企业家，正是这种风险慈善“中间道路”的典范：

凭借我的背景，我确实掌握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并已与多家非营利组织进行了探讨。你会惊讶地发现，像我这样的人习以为常的那些决策方式、问题思考方法以及战略规划方式，对他们来说却是陌生的。这些组织中的许多人从未需要过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关于企业家如何解决问题的一点建议或见解，实际上能产生深远影响，并对他们大有裨益。我将分享举个例子。我正在协助一位女士创办一家新的501(c)(3)非营利组织。我这次破例，是因为我实际上打算加入她的董事会，并帮助她从零开始建立整个组织。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认为自己的帮助能产生多大的杠杆效应。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我每周花一小时亲自参与，或者通过电话等方式，就能对他人产生重大帮助，那对我来说就很有吸引力。这可以说是一种工作与回报的比率。此外，我们还与她共同设立了一个项目，由我们提供其启动资金的一半作为配套资助。这也是创业思维的又一例证。如果我们提供配套资助，当她向其他组织寻求支持时，就可以以此作为筹码：‘看，这家家庭基金会已出资一半，我们需要筹集另一半，能否指望你们？’这非常有帮助。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众多捐赠者践行上述各种形式的案例，因此得出结论：实施一种或多种此类“介于管理型与创业型之间的慈善”策略，是高科技领域捐赠者的显著特征。我们还认为，为了准确描绘高科技领域捐赠者的行为，讨论他们的概念框架需要超越“风险慈善”这一术语，从而突出其与管理型慈善及创业型慈善的重要区别。这三种方法的相似之处在于，每一种都涉及组织领导实践，并注重提升效能。但为了更准确地理解高科技捐赠者实际在做什么，并更好地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可能希望采取的各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策略，有必要认识到管理型、风险型和创业型慈善之间的差异。

事实上，所谓“风险慈善”——或者更准确地说，活跃于各类风险合作伙伴组织中的风险慈善家——的未来，很可能会围绕创业型慈善展开。随着这些高科技捐赠者巩固其财富、获得更多时间来追求慈善目标，并发现他们希望为其发挥超强能动性的事业与人群，这种趋势将愈发明显。

结论

本文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探讨了我们40多年来对财富持有者研究得出的核心发现：即财富持有者的独特阶级特征在于其“超能动性”——即自我塑造和创造历史的能力。当然，并非每个“超能动者”都是富人。一些经济上并不显赫的人，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创造力或精神境界而创造了历史。但在物质领域——包括慈善捐赠——每位财富持有者至少都是潜在的“超行动者”。“超行动力”指的是富裕个体在建立或实质性掌控自身及他人行使能动性的条件方面所具备的增强能力。对大多数人而言，能动性仅限于在所处情境的约束下进行选择并采取行动。作为能动性的“君主”，富人能够突破这些约束，无论结果是好是坏，都能为自己创造一个更符合自身设想的世界。作为普通能动主体，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既定的可能性范围内，努力寻找最佳的居住地或工作岗位。作为“超行动主体”，财富持有者——当他们选择这样做时——能够开辟出广阔的可能性领域，供自己及他人生活和工作。无论继承还是自力更生，拥有雄厚的财力都提供了丰富的物质选择空间，并伴随着“寄予厚望”的相应道德倾向，这使他们有别于社会中的其他行动主体。如果说金钱的一般社会意义是普遍的能动性，那么财富的社会意义便是“超能动性”。

马克思在他的一句著名论断中曾说：“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已经存在、既定并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有已逝世代的传统，像一场噩梦一样压在活着的人的脑海中。”对马克思而言，在他那个时代，一种新事物是可能的——即与阶级社会过去历史的首次真正革命性决裂。当然，这并未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发生；但他所阐述的塑造历史所需条件的一部分，恰恰正是超主体的特征。

也就是说，那些“致力于革新自身与万物，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的人，必须能够做到的不只是“焦灼地召唤过去的幽灵为己所用，从他们那里借用名称、战斗口号和装束，以使用久经考验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来呈现世界历史中的这一新场景”。那些寻求创造性地塑造历史的人，“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其诗意”。行动者往往注定只能在思想和言辞中构想未来，却无法实现其内容。超行动者则不同。对他们而言，“内容超越了措辞”（马克思 1852/1963）。

事实证明，超行动者确实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历史”。作为个体的社会实践，“超行动力”指的是富裕个体增强了有效控制其参与社会行动条件的能力，此外，还能为权力较弱个体的造史潜力设定边界。高科技捐赠者是当代可识别的“超行动者”群体之一；但关于他们及其慈善事业的方方面面，并非如许多人暗示的那样全是新事物。

从主观层面来看，他们与所有富裕捐赠者一样，对自己所拥有的好运既感到内疚又心怀感激；他们受各种慈善动机的驱使——从追求声望、对他人命运的感同身受，到渴望带来改变——并且必须时刻警惕，确保将特殊能力用于关怀而非支配。

同样，将商业原则应用于慈善事业，在高科技捐赠者中并非新鲜事，而是当今及过去许多富裕慈善家共有的特征。尽管高科技捐赠者描述其慈善事业的措辞略有独特，但他们经常追求“跨界慈善”这一事实并非独有。早在1986年，我们就已将创业型、风险型和管理型慈善记录在案（Schervish和Herman，1988），将其视为各类慈善家（包括老钱继承人和传统经济领域的企业家）长期采用的一种做法。按照我们的定义，风险慈善并非唯一或必然的主要跨界策略。管理型和创业型慈善同样重要，甚至更为突出。事实上，我们发现高科技领域的捐赠者与所有财富持有者一样，会采用全套的慈善策略。大多数高科技领域或其他新兴慈善家，都会将向高等教育或健康研究领域的“传统”捐赠作为其首批大额捐赠之一。我们发现，中介型慈善家会向联合劝募协会捐款、资助亲属、斡旋捐赠，并向其本人及家人所使用的服务机构（如宗教团体、学校和博物馆）捐款。

尽管与当代其他财富持有者及历史上的慈善家存在这些共同点，但当今的高科技慈善家仍具有若干鲜明特征。高科技企业

所有者对经济的体验，与小企业主、高薪专业人士、继承财富者以及最精明的市场投资者截然不同。他们在“新经济”中的成长经历，加上普遍年轻的年龄以及财富积累的速度，使他们及其慈善事业呈现出一套独特的关切、态度、希望和陷阱。我们发现，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明确且始终如一地表现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超级行动者”。

他们往往期望并鼓励非营利组织在追求服务目标的过程中，采用效率、战略思维、创新、冒险精神、良好管理、问责制、可衡量目标以及规模扩张等商业目标。他们自信能够发现、识别、应对并缓解社会和组织问题。他们普遍具备乐观、充满活力且善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他们普遍认为，人力资本的教育与开发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杠杆。如果说知识是国家的财富，那么教育和培训就是流通的货币。

当然，他们的自信、积极进取的态度以及相对缺乏经验，有时会使他们显得傲慢自大。然而，我们仅发现极少数此类自负的迹象——尽管各类慈善“超级行动者”一直以来，以及如今再次因影响力过大而遭到尖锐批评。除两名受访者外，其余受访者在访谈中都表现得耐心且坦诚，绝大多数人都热切希望了解他们可能需要解决的需求，以及如何最好地与他人合作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态度和实践中，他们直觉坚定、

且勇于尝试。他们最初将自身能力毫无保留地投入于寻找实现商业抱负的最成功途径，而这正是开展实质性慈善事业的前提条件。在个人层面上，他们的道德历程包括：与财富和解；摸索家庭、事业与慈善之间的平衡；有意识地探索并构建慈善身份；以及寻求自我反思、社交和认同的机会，以便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最大效力。

我们得出结论：前所未有地，如此众多的财富持有者——拥有如此丰富的创业经验、如此年轻的年龄、如此庞大的财富、如此充裕的未来时间，且活跃于如此多的领域——前所未有地，他们在慈善事业上表现得如此自觉地跨界，并如此有目的地进行自我反思。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能通过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因为正是这种“超强能动性”，在带来创造巨大效益的巨大潜力的同时，也潜藏着粗暴干预的风险。正如我们所言，这种“介入性”的双刃剑，既可能带来巨大的关怀贡献，也可能导致专横的支配主张。

参考文献

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布莱恩·S·特纳（Bryan S. Turner）和斯蒂芬·希尔（Stephen Hill）。

1980.《主导意识形态论》。劳特利奇出版社。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布莱恩·S·特纳和斯蒂芬·希尔。

1986.《资本主义中的主权个体》。劳特利奇出版社。

亚历山大，杰弗里·C. 1992. “关于近期社会学理论中‘能动性’的若干评论。”《视角》（美国社会学会理论分会通讯）15:1-4.

阿彻，玛格丽特·S. 1982.《文化与能动性：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1999.《尼各马可伦理学》。第2版。特伦斯·欧文 译、导言、注释。哈克特出版社。印第安纳波利斯。

科尔曼，詹姆斯·S. 1990.《社会理论基础》。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埃米尔拜耶尔，穆斯塔法，与安·米舍。1998。《何为能动性？》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03(4)：962-1023。

吉登斯，安东尼。1984.《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卡尔。1852/196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国际出版社，纽约市。

谢尔维什，保罗·G. 1997. “大额捐赠者，大动

的。”《慈善筹款新方向：大额捐赠的发展》，16: 85-112.

- 谢尔维什，保罗·G. 2006. “财富的道德传记：关于慈善事业基础的哲学思考。”《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35卷，第3期（9月），477-492页。
- 谢尔维什，保罗·G.，普拉顿·库茨基斯和伊桑·刘易斯。1994.《财富福音：富人如何描绘自己的生活》。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
- 谢尔维什，保罗·G. 与约翰·J·哈文斯。2001.《慈善事业的新物理学：慈善捐赠的供给侧向量——第一部分：供给侧的物质层面》。《CASE国际教育进步期刊》，第2卷，第2，第95-113页。
- 保罗·G·谢维什和约翰·J·哈文斯。2002年。“慈善事业的新物理学：慈善捐赠的供给侧向量——第2部分：供给侧的精神层面。”《CASE国际教育进步杂志》，第2卷，第3期，第221-241页。
- 保罗·G·谢维什和安德鲁·赫尔曼。1988.《赋权与善行：富人的生活与捐赠策略》。《财富与慈善研究》最终报告。
- 提交给T. B. 墨菲基金会慈善信托。
- 谢维什，保罗·G.，玛丽·A·奥赫利希，以及约翰·J·哈文斯。2001.《由主体驱动财富与慈善：高科技捐赠者群体中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动态》。波士顿学院社会福利研究所。《2001年高科技捐赠者研究》最终报告。

塞韦尔，小威廉·H. 1992.《结构理论：二元性、能动性与转型》。《美国社会学杂志》，98(1): 1-29。

特纳，斯蒂芬。1994.《实践的社会理论：传统、隐性知识与预设》。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伍德，艾伦·梅斯金斯。1995.《民主对抗资本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复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赖特，埃里克·奥林。1997.《阶级很重要：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保罗·G·谢维什 (paul.schervish@bc.edu) 是社会学名誉教授，现为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他曾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杰出客座教授，以及爱尔兰科克大学学院的富布赖特慈善学教授。他五次入选《非营利时报》“权力与影响力50强”。他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利他主义、道德与社会团结分会颁发的2013年度杰出职业成就奖。谢尔维什是《财富福音：富人如何描绘自己的生活》一书的作者，并与基思·惠特克合著了《财富与上帝的旨意》。他与约翰·哈文斯合著了1998年的报告《百万富翁与新千年》，该报告预言了如今广为人知的41万亿美元财富转移。他们修订后的财富转移模型所作的预测，发表于2014年的报告《宏大预期：持续财富转移的新模型与新指标》中。谢尔维什担任个人及家庭的顾问，并经常在财富持有者、金融专业人士及筹款人的论坛上发表演讲。他拥有底特律大学古典与比较文学学士学位、西北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伯克利耶稣会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

保罗·G·谢维什——简历、报告与文章，作者：

年份